

南宋组织的以白族为主的爨燹军，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流落长江流域，定居于今湖南省桑植县，和当地的土家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桑植等地。

明清时期，白族人民与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和交流也更密切，来往也日益频繁，很多白族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远赴“夷方”务工、做买卖，来往于云南各民族地区，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精美的手工艺品，传播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如白族人民把建筑和制铁技术传到彝、傣、纳西、阿昌等民族地区，把牛耕技术传到怒江傈僳族地区，至今傈僳族地区叱牛耕作的词汇，仍然借自白语；反过来，来往定居于兄弟民族聚居区的白族人民，也不断学习其他少数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优秀文化，如怒江西岸的白族人民大多学会了傈僳族语言，接受了傈僳族的习俗和服饰。

近百年来，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正确民族政策的指导下，白族人民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人民并肩战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成了经受战火和鲜血洗礼的革命情谊。新中国成立后，白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又携手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成了平等、团结、共同繁荣进步的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新型的民族关系。

今天，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主体的白族地区，是我国民族团结、发展、进步的典范。仅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州内共有 43 个民族成分，人口在 1000 人以上的有汉、白、彝、回、傈僳、苗、纳西、壮、傣、阿昌共 10 个民族，其中万人以上的有汉、白、彝、回、傈僳、苗 6 个民族。各个民族团结和睦、并肩奋斗，共同为大理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节 坚定维护祖国统一

白族地区自古以来就自认为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便是唐宋时期的南诏和大理国两个地方民族政权，也立誓“为汉不侵不叛之臣”，积极谋求内附，接受中央王朝的册封。南诏大理国对我国西南边疆的统一，为元代以来的全国大统一创造了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白族人民在共产党的





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实现了云南全省的和平解放，为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南诏、大理国与中央王朝保持密切关系

南诏和大理国是唐宋时期我国西南地区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地方民族政权。两个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有过矛盾，但总体上与中央王朝保持密切的臣属关系。在南诏和大理国统治者看来，两个民族政权从来是大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两个民族政权在 500 年的时间内一直在政治上积极谋求内附、经济文化不断加强与内地联系交流的思想基础。

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共 13 主，历 247 年，其中有 10 主接受唐王朝委任为刺史或封为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王、滇王等。终唐之世，南诏和唐王朝保持密切的臣属关系，使传往来不绝。南诏末期，唐王朝还以宗室女嫁给南诏隆舜为妻。

南诏不仅在政治上臣属于唐王朝，其统治制度也大多直接或间接仿效唐王朝典章制度。南诏初期核心机构设“六曹”，后期改称“九爽”，直接效仿了唐朝“六部”。南诏设六节度、二都督，军事高级人员称“军将”，都直接借用唐王朝军事制度。南诏实行“授田”，仿自内地的均田制，“乡兵”也类似内地的府兵制。虽然上述制度本身实质与唐代内地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名称及设置，都说明了南诏和祖国内地政治上的密切关系。

南诏也积极学习祖国内地先进的经济文化。先进经济生产技术的传入，使南诏的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南诏积极学习汉文化，“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人知礼乐，本唐风化”。唐王朝专门在成都为南诏创办学校，南诏派出大批贵族子弟来学习，前后持续了 50 年，先后培养出南诏子弟数千人。南诏还将汉族知识分子如郑回等人吸收到统治集团中去，教南诏子弟儒学，南诏三代国王凤伽异、异牟寻、寻梦凑都以郑回为师。这些措施，大大地传播了汉文化，促进了南诏文化的发展，也使南诏在文化上更加强烈地认同中华文化。

历史上，唐王朝和南诏出于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和缓解内部矛盾的需要，曾经爆发过短期战争，但都遭到唐王朝和南诏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同时，南诏和唐王朝仍高度重视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在短期的矛盾后很快就重新恢复密切关系。即便是由于唐王朝杨国忠等人乱政，导致南诏“不得已而叛

唐”的天宝战争时期，阁逻凤仍在《南诏德化碑》中立下誓言：“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并言明必将重归于唐的战略选择。其孙异牟寻即位，即遣使三路入唐，表示“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求“世为唐臣”。唐王朝回首往事，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承认过错在唐而不在南诏，并于贞元十年（794年），派节度巡官崔佐时率领唐朝使团到达南诏，与异牟寻会盟于点苍山。同年十月，又命尚书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册南诏使”，向南诏颁发贞元册南诏印，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异牟寻表示“子子孙孙永为唐臣”。南诏归唐进一步密切了南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五代时，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大长和国王郑买嗣之子郑仁旻，派遣使者，以朱鬃白马到南汉求婚，刘龚皇帝以其兄刘隐之女增城郡主嫁与郑仁旻为妻，结为秦晋之好。

作为南诏政权的继承者，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937~1253年）一直和宋王朝（960~1279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宋王朝国力较弱，又面对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政治、军事侵袭，因此总体上对大理国采取了不接触、不接纳的消极政策，但大理国仍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种途径，积极加强与宋王朝的关系，在政治上努力谋求内附，屡次向宋王朝称臣纳贡，请求宋王朝册封。在大理国的积极请求下，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宋王朝册封大理国王“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此后，大理国又多次向宋王朝进贡，请求再次册封。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大理国遣使进贡金装碧环山、刀剑、鞍辔等；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国遣使天驷建彦赓李紫综、副使坦绰李伯祥进京，贡马380匹及麝香、牛黄等珍宝。第二年（即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授大理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大理国又向南宋进贡象、马。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宋王朝已经风烛残年，但大理国仍然向宋王朝效忠，当蒙古贵族发动战争进攻云南，企图借机从南路进攻南宋腹地的时候，大理国将领高禾率领白族人民，在今丽江市九河一带英勇抵抗，打退了蒙古贵族对云南的第一次进攻，高禾战死。宋王朝为了褒扬高禾等的忠勇，专门遣使来大理国吊祭。至今九河还保存有“白王塔”的遗迹，就是为纪念这次阵亡的大理将士。

大理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与祖国内地在经济文化上有着广泛的交流。





经济上，大理国主动向宋王朝上表，请求互市，主动向汉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上仰慕中原文化，屡次到中原购买儒家经典、佛教文献以及其他书籍。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国派遣使臣高泰运向宋王朝求书，“求经籍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又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大理国利贞二年（1173年），大理商人李观音得、董六经黑、张般若师等到广西横山卖马，开列的购买书书单有：《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初学记》，张孟的《押韵》《切韵》《玉篇》《百家书》等。在求书函中写道：“吾闻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大理国使人入宋取大藏经，置五华楼。在长期的经济文化密切交流中，汉文化对大理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元初郭松年在其所著《大理行记》一书中说：“故大理之民，数百年间，五姓固守……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

由上可知，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地区虽然建立了地方民族政权，但在政治上，两个地方民族政权都积极维护中央王朝的权威，努力保持和加强与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则积极向内地学习，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汉文化，加快和强化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南诏大理国的初步统一为全国大统一奠定基础

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疆，民族众多、山川阻隔，虽然云南从汉武帝时期便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但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至隋末唐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经略开拓与设置经营仍未能实现云南的统一，云南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是“部落支离，首领星碎”、“各擅山川，不相役属”的分裂局面。这种部落林立、互不统属的状况，既不利于全国的统一，也不利于云南地方的稳定，更不符合云南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公元8世纪中叶唐朝为抵御吐蕃而扶持南诏统一云南，是一种顺应时代和人民愿望的历史趋势。从南诏统一云南到元代实现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理出一条在云南这样的部落林立、民族众多的分裂局面下与全国实现统一的发展线索和发展步

骤：洱海地区的乌蛮诸部从“毋常处，毋君长”的分散状态经过兼并争战逐步形成“六诏”，即6个实行王权世袭的酋邦；南诏崛起，六诏归一，实现了洱海地区的小区域统一。

南诏时期，除了运用军事征服手段进行统一外，统治者在处理辖区内少数民族事务时采取灵活政策，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效地管理当地少数民族，使之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如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较为先进的主体民族白蛮的贵族阶层，与乌蛮贵族构成统治集团，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对洱海周围和滇东地区的白蛮、乌蛮望族，通过联姻等方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对于山区和边疆地区发展缓慢的世居民族，则通过设节度并派遣官吏进行松散的羁縻统治。到大理国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已由奴隶制发展为封建领主制经济，无需再征服大量的少数民族做奴隶，与南诏相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征战较少。对于山区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则通过盟誓或封赐的方式给予一定的自治权力，通过这些方式，巩固了大理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控制。

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了继汉晋以来又一次范围广、规模大、影响深的民族融合，南诏统治者通过迁移、战争、掠夺等方式，获取了大量汉族人口和当地少数民族，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地方，客观上通过迁移，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区共同生存，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大量内地人口进入云南，融入到当地少数民族当中，为当地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落后民族进入发达地区，学习和借鉴先进民族的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使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重视和笼络汉族及其他民族上层官吏进入统治集团，不仅促进了南诏统治者自身的进步，也增强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特别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积极学习内地的先进经济文化，并将这些先进文化传播到各民族地区。可见，南诏大理国时期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统一，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增强了云南地方民族的向心力，增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

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比如新石器时期在黄河中下游都有不同的文化区，这些文化区逐步融合出现汉族的前身华夏的初级统一体，当时长城外牧区还是一个以匈奴为主的统一体和华夏及后来的汉族相对峙。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渐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





体。”而“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

根据云南的历史事实，可以作出如下的论断：只有当南诏大理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才标志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更进一步的完成。南诏从一个小部落起家，却能够逐步并六诏，平诸爨，在山河阻隔、交通不便、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最终统一云南，建立起我国西南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联合政权，并保持了内部的稳定，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继之而起的大理国白族统治阶级，又在300多年的时间里，政治上积极谋求内附，并大力传播汉文化，促进了自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经过南诏大理国长达5个世纪的地区性统一，不但促进了区域内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最终以一个统一的地方性实体融入到元代中国大一统的版图之中，这种历史进步在当时的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南诏大理国统一云南，维护了西南边疆领土的完整，为促成元代更高层次的全国大统一发挥了奠定基础的历史作用。

三、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促进云南全境解放

在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白族人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白族知识分子、普通群众，都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独立浴血奋战，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功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有共产主义理论家张伯简、清华大学第一名共产党员施澍、云南省第一名女共产党员赵琴仙等优秀的白族儿女，为党和民族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抗日战争时期，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白子将军”周保中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为民族解放立下殊功（事迹详见“近现代有影响的文化人物”）。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各地的白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武装革命斗争，粉碎了国民党把云南作为反共基地的图谋，为云南的解放、国家的统一作出

郭家骥：《地区性初级统一为全国大一统奠定基础——论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作用》《云南社会科学》，2009，（4）。

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云南，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掀起内战，并把西南地区作为一个重要的反共基地。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云南省党组织抽调了一批干部深入白族地区，领导和组织各族人民与反动派进行斗争。1947年秋，共产党先后在剑川、鹤庆、大理、祥云、丽江等地建立了党的地下县、区组织。白族人民提高了革命觉悟，踊跃参加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为开展武装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1949年4月，剑川各乡武工队员200余人编为“剑川人民自卫队”，发动武装暴动，攻占剑川县城，活捉了伪县长。其他各白族地区也先后发动起义，攻占了区、乡公所。9月，人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七支队”。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向华南、西南挺进。国民党反动派纠集残兵败将，妄图在云南负隅顽抗，把云南建设成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统治区和反共基地。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广大白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捐献粮款，踊跃参军，为部队当向导、送军粮、送信，等等，支援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人，经过乔后、沙溪、乐天场、剑川等十余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为解放云南全省，迎接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滇西北武装斗争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他白族地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活动在祥云一带的游击队，逐渐发展到200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949年12月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八支队”。元江因远坝白族地区，早在1946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1949年3月，游击队到达因远坝进行整训，绝大多数白族青年都加入了部队。5月，这支游击队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十支队”，8月解放了元江县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12月9日云南的和平解放，使广大的白族人民受到极大鼓舞。我七、八支队也迅速摧毁反动政权，建立了十五个县（市）人民政府，1950年2月1日成立了大理专署。从此，白族人民获得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跋山涉水，胜利进驻大理地区与七、八支队胜利会师，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计划建立陆上基地的阴谋。

